

江西文化概论

JIANGXI WENHUA GAILUN

(修订版)

沈建华
方志远

主编

汪红亮

副主编



JIANGXI WENHUA GAILUN (XIUDINGBAN)

江西文化概论

修订版

沈建华 主

方志远 汪红亮 副主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西文化概论 / 沈建华主编. —修订版. —北京 :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304-06716-8

I. ①江… II. ①沈… III. ①地方文化-文化
研究-江西省 IV. ①G127.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98007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江西文化概论(修订版)

JIANGXI WENHUA GAILUN (XIUDINGBAN)

沈建华 主 编

方志远 汪红亮 副主编

出版·发行: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电话: 营销中心 010-66490011

总编室 010-68182524

网址: <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45号

邮编: 100039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策划编辑: 袁玉明 王鑫鑫

版式设计: 赵 洋

责任编辑: 庄 颖

责任校对: 李 欣

责任印制: 赵联生

印刷: 北京密云胶印厂

印数: 0001~5000

版本: 2014年9月第2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 185mm×230mm

印张: 18.25 字数: 336千字

书号: ISBN 978-7-304-06716-8

定价: 38.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江西历史与文化散论（代序）

方志远

一、“听话”的“摇篮”

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以江西余干县的万春乡，以及鄱阳、乐平、贵溪三县部分地区，置万年县。“万年”之说，一是因为境内有“万年山”，二是因为希望这一地区万年太平。但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成为一个谶语。

20世纪80年代，万年县一位喜欢郊游的年轻干部在大源盆地无意中发现一个洞穴，并把这个发现告诉30岁出头的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朋友王炳万。王炳万经过实地考察，凭着自己的专业敏感，认为这里可能居住过古代先人，并且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时任江西省考古队队长的彭适凡教授。

此后，经过江西省考古队，特别是由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和美国学者马尼士博士率领的中美联合考古队的多次发掘，取得了震惊世界农业考古界的发现：原来万年县大源盆地的“仙人洞”和“吊桶环”，万年之前曾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古人类的居住地和活动区。尤其让人惊讶的是：这些古人类竟然在约1万年前就开始了陶器的制作与谷物的栽培。

这是目前中国也是亚洲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栽培稻信息。这个发现，不仅把中国的人工栽培稻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几千年，而且把江西的人类活动历史向前延伸了近万年。

此后，距今三千多年前的樟树吴城方国遗址的发掘，表明这里曾是中国长江以南最早跨入文明门槛的地区之一。瑞昌商周铜矿遗址、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器的发现，则见证了那个时代江西的矿冶技术和青铜文明。

但是，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江西大地上的先人放慢了行进的步伐，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关他们活动的记载，所以，与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是辉煌辉煌的繁华之地相比，如以临淄、曲阜为中心的齐鲁地区，以洛阳、邯郸、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苏州、绍兴为中心的吴越地区，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巴蜀地区，以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以太原为中心的三晋地区，以荆州为中心的江汉地区，江西在整个中古时期的发

展颇有差距。

许多朋友讨论过江西的文化特点，讨论的结果很失望：没有特点。以语言为例，广东有“白话”，福建有“闽音”，湖南、湖北、四川话充斥银幕，听来觉得很有趣。但江西没有这样具有地区认同的“江西话”，吉安人不买南昌话的账，南昌人拿抚州话开涮，大家聚在一起，只好说全国通行的普通话。

这一情况的发生，和江西在“列国”并起的过程中没有产生自己的政治中心有直接关系。江西的地理位置可说是“吴头楚尾”，既是吴，也是楚，但却是吴的边缘，也是楚的边缘。秦始皇兼并六国，汉设“豫章郡”，才有了一个“江西文化”的稳定载体。而这个“豫章郡”，竟然是在两千多年前“一步到位”的“江西省”，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把东起怀玉山、武夷山，南至九连岭、大庾岭，西起罗霄山、幕阜山，北连赣江的这块“天然成一统”的地域，用“豫章”二字固化下来。此后，又有“江南西道”“江南西路”“江西行省”“江西布政司”“江西省”之称，均由“豫章”延续而来。可以说，没有秦汉的大一统，就没有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江西和江西文化。

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了江西此后的两个特点：一是“听话”，二是“摇篮”。或者说，江西是“听话”的“摇篮”。听谁的话？听中央的话。是谁的摇篮？过本分日子的人，特别是形形色色各色杰出人物的摇篮。

小时候读历史书，总是很郁闷：为什么好玩的事情、打得一塌糊涂的战争，从来就不发生在江西？江西怎么就没有好玩的地方、没有打仗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从来就不是政治中心、不是高消费中心，从来就不是兵家必争之地？后来学历史，渐渐为江西感到庆幸。原来，正是因为不是政治中心、不是高消费中心，所以江西才没有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才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成为“战场”，江西的生态、江西的人文才没有受到大的破坏。战争都在外面打，只要能够在中原地区打遍天下无对手，把中原的事情搞定，能够建立起政权，军队到江西，江西人一定拥护。只要不过于捣乱，江西人一般不反抗。只要是中国人，只要不过于贪得无厌、弄得国无宁日，管他姓刘姓李、姓赵姓钱，江西人觉得谁做皇帝都一样。

所以，江西从来就听中央的话、从来就学中原的样子，因为江西这块地域的形成，是中央一步到位划定的；江西的居民，也大多是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后裔。不管别的地方乱得多么一塌糊涂，江西都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江西人民照常读书，照常养猪，照常求功名，照常过男耕女织的太平日子。这里是休养生息的好地方，是培养人才的好地方。所以，江西虽然一般不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

却是培养政治家、理财家、文学家、思想家的摇篮，是传统农业、手工业、矿冶业产品的生产摇篮。到近代，江西又成为培育革命领袖、革命军队、革命政权的摇篮。但是，要成为大政治家、大理财家、大文学家、大思想家，要做大企业、发大财致大富，要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权，却必须走出江西这个摇篮。没有办法，这是“摇篮”的地位所决定的。^①

二、机遇“千年等一回”

王勃在初唐时盛赞江西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其实是外地客人对主人盛情款待的客套。但这个好意的客套却成了中唐即公元8世纪以后江西发展的预言。

江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以及传统文化的发达和繁荣，是与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同步的。其间，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政治中心的东移和运河的开通，使赣江水道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主要通道，江西成为全国交通格局的中心位置。

大运河开凿之前，中国南北水路交通的最长航道有两条：一为汉水—长江—湘江、沅江，一为汉水—长江—赣江。灵渠的开凿以及秦岭和大庾岭山路的大规模拓展，使这两条航道在陆路的连接下向北延伸到了黄河水系的渭水和珠江水系的西江、北江，并进而沟通了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

自秦汉到隋唐，政治中心一直在关中，从西北政治中心地区到东南经济重心地区的水路沟通主要是由汉水和长江完成的。而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对接的内河交通，则是汉水—长江—湘江—西江—珠江。

两汉时期，关中地区的财力已表现出难以支持全国政治中心的无奈。从隋文帝带领政府官员和关中百姓“就食”洛阳，到隋炀帝营建东都、开凿运河，实质上反映了西部政治中心从被动到主动向东部经济重心靠拢的趋势。五代到北宋这一时期，完成了中国政治中心的东移过程；元、明、清的定都北京，更巩固了中国政治中心东移的格局。虽然比起开封，北京距离东南经济发达区更为遥远，但运河的全线开通，却将这一空间距离大大缩短。

政治中心东移及大运河开通之后，汉水—长江—湘江—西江—珠江这一南北交通要道失去了往昔的地位；而运河—长江—赣江—北江—珠江则成为国内主要的南北通道。

^① 方志远：《“摇篮”说》，载《南昌大学学报》，1993年“赣文化”增刊。

这条通道全长近3 000千米，贯穿今日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广东8省市，在江西境内几占1/4。

有意思的是，政治中心的东移及大运河的开通，即中国中古至近古时代政治格局与交通格局的变化，都与一个被妖魔化的人物——隋炀帝有关，因此，所有地方的人民都可以骂隋炀帝，但至少扬州人民和江西的人民需要感谢他。因为他的“下”扬州，给扬州带来了取之不尽的文化遗产；因为他组织营建东都洛阳和开凿大运河所造成的中国政治格局和交通格局的变化，给江西经济文化带来了“千年等一回”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发展机遇。

其二，江西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农业生产而且较少成为兵家争夺之地，故而远离战乱。

公元8世纪以后江西经济文化的发展，又与中原地区发生的三次大的长时期战乱关系密切。第一次是两晋之际发生的“永嘉之乱”，在中国历史上也称为“五胡乱华”，这一事件导致北方的长期战乱和中国境内南北政权的对峙；第二次是唐朝天宝年间发生的“安史之乱”，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北方陷入长时间的动荡和藩镇割据；第三次是两宋之际发生的宋金战争，导致了宋室的南渡和宋金之间的持续战争及对峙。

这三次战乱都导致了北方居民的大规模举族南迁。为了逃避战乱而发生的北方民众的南迁，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远离战争，这是为了保护生命的需要；二是不过于远离战争，这是为了保护财产（主要是房屋、土地等不动产）的需要，也是为了维护家族政治地位的需要。所以，北方居民迁徙的落脚点，总是在那些既远离战场又便于返回中原的地区。于是，当战乱发生在黄河流域时，移民便主要迁移至江淮之间，江西北部开始接纳移民；当战乱延伸到淮河一线，移民便迁移至长江以南，南昌、鄱阳、宜春、吉安、抚州乃至赣南也有了北方移民；当战乱蔓延到长江两岸，移民便更集中地南迁到吉安、抚州、赣州。

北方移民洪水般地涌入，不仅为江西的开发带来了大批劳动力，更将相对发达的中原文化及宗族制度带到了江西，促成了近世以来江西家族的发达和“耕读治家”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与江西的自然生态环境相结合，使得江西人进入仕取得功名，退可家居温饱无忧。孟子所说的“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江西人为其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此后江西的发展，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三、发展的“黄金期”

公元8~18世纪，也就是从中唐开始到清朝中叶，是江西经济文化发展的“黄金期”。

人口的多寡是古代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硬指标”。经过从秦汉到隋唐的积累，到两宋时期，江西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先进地区，其人口之众、物产之富，均居各路前茅。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在册户口数为2 026万户，4 532万口，其中江西地区为201万户，446万口，约占1/10，居各路之首。历元至明，江西的这一经济优势继续保持并有所加强。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江西在册户、口数分别占全国的20%、23%，居各省之首。明代江西在册人口仅次于浙江而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

缴纳税粮的多少，是衡量地区间经济发展和地位的又一重要参照系。安史之乱后，江西成为唐王朝财赋重心之一，“朝廷倚为根本，民物赖以繁昌”。白居易《除裴堪江西观察使制》称：“江西七郡，列邑数十，土沃人庶，今之奥区，财赋孔殷，国用所系。”《宋史·地理志》述江南东西路的物产及缴纳税粮盛况：“（自）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而茗荈、冶铸、金帛、粳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人焉。”^①北宋江西籍文学家曾巩讲洪州一州，“其赋粟输于京师，为天下最。”^②吴曾《能改斋漫录》记南宋漕粮数：“本朝东南岁漕米……诸路共计六百万石，而江西居三之一，则江西所出为尤多。”^③至元代，江西仍然是朝廷财富的主要供应地，所缴赋税一直位于各行省前列。历元至明，江西的这一经济地位仍然继续保持。明代江西人口次于浙江而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江西每年所纳税粮，据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和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的统计数据，却超过浙江，由此可见产粮之富，也可见其经济地位之重。清代前期，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江西经济地位有所起伏，但大体说来，仍具有重要地位，其时江西缴纳的田赋占全国总量的一至二成。因此，自五代两宋直至清前期，江西既是人口稠密之地，又是财富聚集之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此外，这一时期，江西的其他农副产品，如茶叶、纸张、苧麻、兰靛、木竹、油料以及制瓷、造纸、木竹加工、夏布、火药等手工业也都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

经济的发展，使江西逐渐取得了辉煌的文化成就。

以科举而言，宋代江西一地即有进士五千余人，且多一门数进士的情形，如王安石、曾巩、刘恕、孔文仲等一门三进士，洪迈一门四进士，著名的乐安流坑董氏家族更

① 脱脱等：《宋史》，卷88，《地理志四·江南东西路》，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② 曾巩：《洪州东门记》，见雍正《江西通志》，卷123，《艺文》。

③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3，《记事·唐宋运漕米数》，《四库全书》本。

有一门同科五进士之事，时号“五桂”。^①更重要的是，宋代江西向华夏文明贡献了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以节义论，有胡铨、洪皓、江万里、文天祥、谢枋得；以政治论，有欧阳修、王安石、周必大；以文学论，有晏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刘辰翁；以史学论，有欧阳修、刘敞、刘恕、刘攽、乐史、徐梦莘、徐天麟；以哲学论，有李觏、周敦颐、朱熹、陆九渊；以科学论，有曾安止、张潜；以艺术论，有范宽、徐熙、黄庭坚等。“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②

迄明代，江西文化继续着这种辉煌。明朝的所有故事，无论是风光的故事还是尴尬的故事，都少不了江西人的表演：俊彩奔驰的江右王门令人神往，“朝士半江西”的盛况至今人们还津津乐道，赤手搏龙蛇的异端开风气之先。明代的江西至少存在三组对应的文化现象：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正统文化与异端文化、摇篮文化与主流文化。这三种文化又在不断地转化之中。

尽管地位有高低，境遇有贫富，以今天的眼光看，朱权、解缙、杨士奇、汤显祖、宋应星、艾南英等人所代表的，自然属于精英文化；而大量无名氏的农民、工匠、商人、术士、儒士在生产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则应该属大众文化。三千名进士、数量居全国首位的举人，以及无数修习“举业”的士人、无数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仕途的各色人等，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主要是正统文化；而朱季友、李孜省、乐新炉、颜钧、何心隐，以及尚未被主流思潮接受时的吴与弼及王门诸弟子、被正统儒学视为邪术但又在江西乃至全国广泛流行的种种思潮及法术，自然属于异端文化。

由于从来没有成为过全国性的政治中心，甚至也很少成为区域性的政治中心，江西更多时候表现出来的往往是摇篮文化的特征。从这里可以走出未来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文学家，也可以走出未来的富商巨贾，却很难有“土生土长”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文学家，更难以在本地产生富商巨贾。但在明代，江西文化一度由摇篮文化演变为主流文化，这里一度成为政治中心、学术中心、经济中心，并产生了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王阳明的心学在这里由异端变为主流，汤显祖、宋应星、艾南英也在这里完成了由大众文化向精英文化、由摇篮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转变。江西发生的这些现象，在全国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无论是精英文化、摇篮文化、正统文化，抑或是大众文化、主流文化、异端文化，以及有名无名的代表人物，均在明代社会历史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现象在南宋也发生过，朱熹、陆九渊、江万里等人在白鹿洞书院的

① 按：宋代进士问题比较复杂，有“州进士”“部进士”之分，这个五千余名进士即包括各类进士。与明清时期的进士有《进士题名碑录》又大不一样。

② 洪迈：《容斋随笔》，卷5，《饶州风俗》，《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讲学、在鹅湖书院的辩论、在白鹭洲书院的传道，使江西一度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

明世宗嘉靖末年严嵩的倒台，标志着江西仕人退出了中央决策圈。江西在进士榜的排名，也由全国第一退居第三（落后于南直和浙江）。严嵩的倒台看似偶然事件，却蕴含着必然性，那就是随着明朝前期对江南最发达地区的苏、松、杭、嘉、湖地区的压制政策成为历史，江南地区重新展示出它的强大经济、文化实力，从而在政治上重新把江西挤于身后。进入清代，江西政治文化继续边缘化。表现在科举上，清代江西的进士人数屡屡下降，在全国的排名也屡屡落后，明代“朝仕半江西”的盛况不复再现。这预示着江西在朝廷中发言权的丧失，也使江西的正统文化不再风光。另外，无论是清统治者，还是抱着经世致用的乾嘉学者，都以“空疏”为借口，不遗余力地抨击江右王门，江西的异端文化遭受重创。当然，尽管清代江西文化的整体气势不足以与宋明比拟，但在一些具体的文化领域，仍然如点点繁星，闪耀着创新性的光辉。如八大山人的书画创作，蒋士铨的《藏园九种曲》、“样式雷”世家的建筑艺术等，都不逊色于此前任何一个时代，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别要指出的是，尽管精英文化受挫，但大众文化依旧辉煌，江西商人也进入活跃期。

四、无处不在“江右商”

江西社会经济的发展，使部分地区开始出现人口过剩现象，并刺激了豪族大户对土地的兼并，从而导致鄱阳湖区和吉泰盆地等经济发达区大量农民的脱籍外流。以元末明初的“江西填湖广”为发端，一直延续到晚清，500年间，江西约2 000万在册人口流出省外，并在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留下了至少1亿后裔。在这些江西移民中，工商人口占相当大的比重，他们或久居一方，或往来于江西与各地之间，形成了人数众多的江西商人的巨流。由于当时江西又称“江右”，而江西商人又往往结成商帮从事经营，故被称为“江右商人”或“江右商帮”。

湖南、湖北是江西商人的主要活动地区，致有“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民谚；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是江西商人活动的又一重要地区，特别是云贵，时称“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福建、广东也遍布江西商人的足迹，特别是福建武夷茶的加工和经营，江西商人起着重要的作用；明朝时，地处中原的河南，由于江西商人势力强大，布政使年富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甚至请求明廷将其尽行驱逐。北京是明清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明人张瀚的《松窗梦语》说：“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伙，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

次之。”有学者统计，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者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清光绪时，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为51所，占12%，比重虽少于明朝，但仍居各省之首，比当时势力最大的山西会馆（45所）还多。虽然对于这些会馆的性质迄今仍有争议，但其中相当数量为商人所建或仕商合资共建则毋庸置疑，由此可见江西商人在京的地位。位于东海和黄海之交的“琉球”（今日本冲绳），以及安南、占城（今越南），时为明清的“藩属”，其通事来中国，汉语娴熟，竟多为江西商人。^①

当然，江西商人最为活跃的地区，仍然是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四川。故此，前往西南地区可对当年江西商人的活动进行考察。

湘潭在清朝为“壮县”，知县号称“不贪不滥，一年三万”。这相当于近千万元人民币的购买力。一年3万两白银，全靠商人进纳。县城极盛时有56个商人会馆，其中16个为江西商人的会馆。在湘潭，昔日宏伟的江西会馆牌楼和万寿宫码头极为震撼，始建于清朝顺治七年（1650年）的江西会馆后花园中的“夕照亭”，至今仍屹立于雨湖畔。长沙人有时不解，来自湘潭的毛泽东为何以能在长沙的橘子洲头指点江山？殊不知，由于江西商人和其他各地商人的打造，湘潭当年的繁荣程度超过省会长沙，因此，来自湘潭的毛泽东比一般的长沙人眼界和境界都要高。

经过作家沈从文和画家黄永玉的渲染，以及二十多年的维护和开发，当年的江西商业重镇湘西凤凰城如今已是中國名城，至今仍有数千江西丰城石滩镇商人的后裔。使凤凰城成为文化名城主要标志的，是江西会馆“万寿宫”。苗族同胞、凤凰文馆所龙所长认为：“如果说凤凰城是只凤凰，那么，凤凰的翅膀是由江西商人插上的。”晚清时期，这里成为军事重镇，贵州苗民军功获“顶子”^②者甚多。因而凤凰城号称有两多：江西商人的银子多、贵州苗军的顶子多。

同样地处湘西的洪江，以沱江为依托，当年是湘黔边境的商业重镇，至今仍然保留着全国最为完整的古商城。这里最大的行业是造船业所必需的桐油业，桐油业的主要经营者是江西商人。当地居民介绍，当年的洪江，每天傍晚是三种响声：军民人等的交杯换盏声、江西商人的数白银声、商船靠岸的号子声。

四川成都西南郊的洛带镇，如今已经开发成著名的古镇旅游景点。而洛带镇旅游景点的基本构成，是清代建成的江西会馆、湖广会馆、广东会馆。面对江西会馆前宏大的“万年台”，当年江西商人组织演出的“弋阳腔”戏班，宛在眼前。而史料上所记载的

① 方志远：《明清江右商帮》，香港中华书局、台湾万象书局，1995。

② 顶子：清代礼帽顶饰，是区别官员品级的重要标志，在此指获得官职。

重庆、江西会馆每年超过300场的演出，当不是出于虚构。

云南威信县县城的所在地在扎西镇。1934年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在扎西镇会师，一方面军及中央红军总部驻江西会馆、二方面军总部驻湖广会馆。因为这个当年汉藏杂居的小镇，商人的会馆乃是城里最豪华的建筑。时至今日，湖广会馆和根据原貌重建的江西会馆（现名扎西会议纪念馆）仍然是扎西镇的大去处。

贵州镇远县的青龙洞周边，也建成了规模宏大的旅游点。这个旅游点的核心，是江西会馆“万寿宫”。江西商人之后，福建商人、广东商人、湖南商人也来到了这里，各自建起了会馆，青龙洞遂成了“会馆”街。

在当时的中国，哪里有江西移民，哪里就有江西商人；哪里有江西商人，哪里就有江西会馆（万寿宫）；哪里有江西会馆，哪里就唱江西戏（弋阳腔）。据“青藤山人”徐渭《南词综录》，弋阳腔在明代的中后期为国内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而近人丁文江院士在重印《天工开物》时为作者宋应星作序，特别指出：作为分宜县学教谕的宋应星，所以能够写出《天工开物》以介绍手工业特别是矿冶业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技术著作，是因为当日中国之矿业，“皆操于先生乡人之手”。也就是说，当日中国的矿业多在西南，而西南地区的矿业大抵上由江西商人经营。

五、19 世纪的衰退

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国内政治经济大格局的变化，江西在经历了千年的发展并在经济文化居于全国先进行列之后，开始没落到“欠发达”的地位。如果分析其具体原因，大致有以下数端。

（一）战乱

如前所述，自唐末五代至两宋，江西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很大程度是因为北方战乱而导致的人口南迁。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南宋末年的宋元战争、元明之际的红巾军大起义、明清之际的农民大起义、清军入主中原及平定南方的战争、清初三藩之乱等大规模战乱中，江淮、江汉、西南、中原乃至江南的部分地区，都一次或数次卷入战祸，江西则受害较小，社会财富及生产条件没有遭受大的破坏。但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江西却两次经历了长时期的战火蹂躏，造成了人口锐减和山林焚毁。道光三十年（1850年）江西在册人口为2 450万，到1953年统计时，仅1 670万，100年间，人口不但没有增长反倒减少800万。江西商人赖以生存的主要商品，如茶叶、纸张、木材等的生产则因山林焚毁而受到严重破坏，景德镇的瓷业也一度陷入停产。

（二）交通格局的变化

从中唐到清前期，运河—长江—赣江—北江一直是国内主要的南北通道，它对于促进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清中期，长期以来对山林的超量砍伐及开山造田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开始显现，水土流失严重，赣江水运发生困难。几乎与此同时，运河的淮河—黄河段因黄河泛滥及改道而淤塞，南北水道被拦腰截断。尤其是京汉、粤汉铁路修通后，南北运道改走两湖、河南，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虽然后来有浙赣线，但只是在赣北过境而过，整个赣中、赣南因远离交通线，物质流通十分艰难，过境贸易也相当稀少。由于交通格局的变化，从外部渗入的新思潮、新风尚也绕过江西，或沿广东、湖南、湖北，或沿上海、江苏、安徽，向中原挺进和扩散。这些新思潮、新风尚在扩散过程中，又不断地被抵制、被削弱、被改造，然后再反射到江西，致使江西在观念的更新上，不仅落后于沿海，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线上的湖南、湖北、安徽等地。

（三）经济格局的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外国资本开始渗入沿海地区。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开始兴办近代私人企业。《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资本深入沿（长）江地区，辽东、山东、云南、广西等地相继被纳入外国资本的势力范围，近代民族资本也开始生长。

在这一形势下，江西虽然也有九江一个口岸对外通商，但在南浔铁路修通之前，九江更多的是与沿江的汉口、安庆连为一线，与江西内地的联系反倒薄弱。以明时九江钞关（明代内地征税的关卡）为例，它主要只能对长江江面往来的商船收税，在没有设置湖口分司时，管不到出入湖口下行的商船。即使南浔铁路开通之后，也只有赣北地区才与九江联系较为密切。

20世纪初开始，九江、南昌也先后出现了一些近代企业，但无论从速度还是规模看，不仅落后于东南沿海各省，也落后于湖南、湖北等内地邻省。除了夏布、瓷器等极少数手工业品仍有一定的市场外，江西一度居领先地位的传统手工业品已无法与洋货及沿海地区的工业品竞争。

（四）自身的弱点

鼎盛的科举文化，曾给江西带来过许多个世纪的骄傲，但也使江西重功名、轻工商的“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小有积累的江西商人一旦摆脱贫困，便将资金投放在后人的举业之上，希望子孙进入仕途，光宗耀祖，或者花数百上千两银子为自己及子弟捐个空头官衔，以改变在家族及社会中的地位。截至太平天国起义之前的清代，资本并非雄

厚的江西，以捐钱为手段而获得的国子监监生的名额，竟居全国首位。不少学者曾指出，文章节义为江西人的传统美德，但这种“美德”主要是受到正统儒家思想的熏染，它有利于农业社会的巩固，却不利于商业社会的形成。背上这种包袱，江西商人远不如闽商、粤商、晋商、浙商那样潇洒轻松。

嘉靖末年严嵩的倒台，标志着江西士大夫开始退出中央决策圈；而人口的流动和大量俊秀子弟从事工商业，使得江西在清代的科举入仕人数较明代大为减少。这样，缺乏以特权为依托的江西商人很难与徽商、晋商相抗衡。与此同时，江西商人虽然有人数多、操业广、渗透力强等优势，但存在以商脱贫、资本分散、小本经营等先天不足。长时期以个体经营为主要方式，使得本来就分散的资本难以集中。

尤其遗憾的是，即使在江西经济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即使在江右商始与徽商争雄、继与徽商、晋商三足鼎立的时代，江西官员、江西商人也没有在江西营造出一个像广州、汉口、南京、上海，或者是杭州、苏州、扬州，乃至临清、湘潭那样的大都市或消费中心乃至商业中心，因而无法刺激消费水平的提高，也无法吸引外来的消费者。同时，江西也没有形成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市镇辐射网络，整个商业活动始终停留在以商补农、以商脱贫的低层次上。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江西。江西在中国格局中地位的衰退，与同一时期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衰退几乎是同步的。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地位的重新崛起，江西的崛起也应该指日可待。但是，需要江西民众与当年一样，带着平和的心态而非焦虑的心态，在改变中国大格局的过程中，在维护这片蓝天、这方绿土、这汪清水的过程中，稳步前进。

方志远

2014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江西文化发生与生存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	(1)
第一节 豫章郡的设置与江西文化载体的形成	(2)
第二节 江西的地理区位、山川地貌与水文气象	(7)
第二章 史前及商周时期江西的初始文化	(15)
第一节 吊桶环遗址、万年仙人洞遗址显示的江西先民生存文化	(16)
第二节 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向江西的渗透和传播	(22)
第三节 “吴头楚尾”：江西文化与吴越文化、荆楚文化	(28)
第三章 江西文化与中央文化、中原文化	(35)
第一节 北方动荡与江西人口的构成	(36)
第二节 经济重心南移与江西经济文化地位的提升	(47)
第三节 正统文化与异端文化：江西文化的双重属性	(51)
第四节 江西的异端文化	(56)
第四章 江西儒家文化	(67)
第一节 书院与科举	(68)
第二节 朱学、陆学与王学	(74)
第三节 文章节义之邦	(80)
第四节 家族与族训	(84)
第五章 江西宗教文化	(93)
第一节 佛教文化	(94)

第二节	天师府、万寿宫与道教文化	(104)
第三节	利玛窦与基督教文化	(112)
第四节	彭莹玉与秘密会社	(116)
第六章	江西生产文化	(119)
第一节	《禾谱》与稻作文化	(120)
第二节	《茶经》与茶业文化	(123)
第三节	“瓷都”景德镇与陶瓷文化	(127)
第四节	“药都”樟树镇与药业文化	(134)
第五节	《天工开物》与矿冶、纸业文化	(140)
第六节	“样式雷”与建筑文化	(146)
第七章	江西移民与商人文化	(149)
第一节	《岛夷志略》与江西海外移民	(150)
第二节	江西移民与“江右商帮”	(153)
第三节	天下“万寿宫”与遍地“弋阳腔”	(158)
第八章	江西文人文化	(165)
第一节	欧阳修与文学、史学	(166)
第二节	朱思本与地理学	(173)
第三节	汤显祖与戏曲	(177)
第四节	八大山人与书画	(185)
第九章	江西民俗文化	(189)
第一节	“傩舞”与原始信仰	(190)
第二节	“三寮村”与风水文化	(193)
第三节	“乐平戏台”与民间戏剧文化	(197)
第四节	“竹枝词”与民歌时调	(201)
第十章	江西“红色文化”	(205)
第一节	“八一”起义与英雄城南昌	(206)

第二节 “秋收起义”与安源工人俱乐部	(210)
第三节 “革命摇篮”与井冈山精神	(213)
第四节 “红都”与“将军县”	(220)
第十一章 江西文化遗存	(227)
第一节 物质文化遗存	(228)
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存	(244)
附录 江西历代政区沿革表	(259)
参考文献	(272)
后 记	(274)